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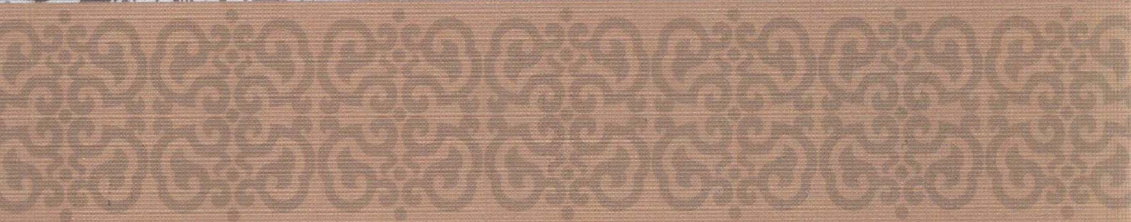


张玉来 © 主编

漢語史與侏藏語研究

第一輯

南京大学汉语史研究所主办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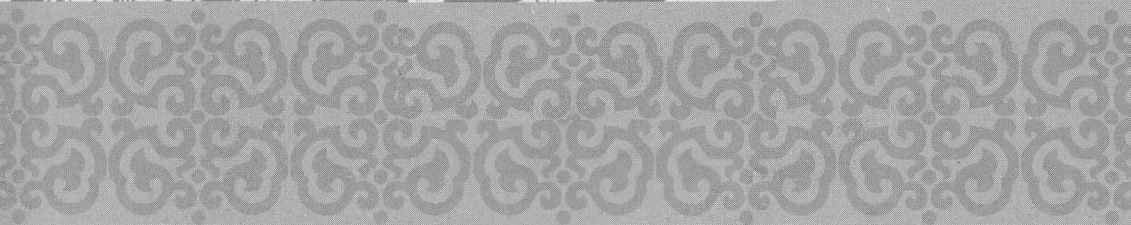


张玉来 © 主编

漢語史與侏藏語研究

第一輯

南京大学汉语史研究所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 第一辑 / 张玉来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203-0785-7

I. ①汉… II. ①张… III. ①汉语史-语言学史-研究②汉藏语系-研究
IV. ①H1-09②H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118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309 千字
定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学术组织

学术顾问

戴庆厦 丁邦新 江蓝生
蒋绍愚 孙宏开 王士元

编委会

曹志耘	陈保亚	程邦雄	邓晓华	方一新
冯胜利	胡敕瑞	黄德宽	黄树先	江 荻
蒋冀骋	蓝庆元	李小平	李运富	刘丹青
刘 钊	麦 耘	秋谷裕幸	任 明	沙加尔
沈钟伟	孙天心	谢晓明	邢向东	杨永龙
杨亦鸣	袁毓林	张美兰	张涌泉	张玉来
朱晓农	庄初升	周及徐		

主 编

张玉来

编辑部

陈文杰 魏宜辉 王 玲 徐世梁 张福通
苏 婧

南京大学汉语史研究所学术组织

学术顾问

冯 蒸	黄 行	黄天树
李 开	马重奇	王洪君
吴安其	尉迟治平	竺家宁

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

黄德宽

委 员

陈忠敏	冯胜君	洪 波	黄德宽	黄仁瑄
白田真佐子	孙景涛	唐贤清	陶 寰	汪维辉
王云路	王立军	吴福祥	杨宝忠	徐在国
徐正考	徐时仪	张树铮	张玉来	郑振峰
朱庆之				

目 录

人类起源、语言的形成及其演化问题

…………… 王士元 演讲 吴璐 曹鹏鹏 整理 (1)

音法研究与音史研究 …………… 麦耘 (24)

“突变”还是“感染”:关于汉语历史音变模式的思考

——以四川地区方言的平翘舌音声母对立现象为例 …… 周及徐 (37)

台州方言差比句的类型和演变 …………… 阮咏梅 (46)

认同行为与语音变异

——以(i)变项、(y)变项、(-ʔ尾)变项为例 …… 王玲 (59)

英·汲约翰编撰《潮正两音字集》(1909)潮、正音系研究

…………… 马重奇 马睿颖 (72)

《中原音韵》与南曲用韵 …………… 张玉来 (106)

《悉昙藏》所引《四声谱》解读 …………… 于建松 (119)

谈书面音系的“存雅求正” …………… 孙志波 (127)

论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的象数及其语音问题 …… 杨曦 (137)

高丽藏本慧苑音义的讹、脱、倒问题 …………… 黄仁瑄 (161)

《曹刿论战》释疑三则 …………… 陈文杰 (190)

复封壶铭文补释 …………… 魏宜辉 (201)

上古汉语副词“方”用法辨析

——《副词“方”多种时体用法的关系》献疑 …… 张福通 (212)

《战国策》“贾不归四国”之“归”义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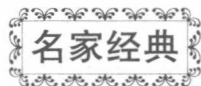
——兼谈“归”与“馈”的关系 郭浩瑜 (222)

汉语是抑扬还是扬抑格词模式语言？

——昆虫名的词形韵律结构变化的启示 江 荻 郭承禹 (235)

“雨”音义研究 黄树先 (265)

汉藏语词汇语音结构的演变与轮回 庄会彬 (272)



原始汉语研究的方向 严学窘 (281)

稿约 (290)

人类起源、语言的形成及其演化问题*

王士元¹ 演讲

吴璐² 曹鹏鹏² 整理

(1. 香港理工大学; 2. 南京大学文学院)

摘要: 本文主要对“人类起源与语言能力的形成”“现代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迁徙”“语言的涌现及设计特征”“人类的发音机制”“语言中的歧义”“语言的变化”和“语言的研究方法”等诸多与人类起源、语言形成及其演化相关的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语言的研究是涉及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心理学、生物学、神经学、遗传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在21世纪,要实现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用宏观的跨学科的眼光来了解语言,分析、探讨语言的真实面貌,也要研究语言的生物基础及社会关系。

关键词: 人类起源; 语言形成; 语言演化

一 人类起源与语言能力的形成

蔡元培先生(Cai1928: 1)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时曾言:“同是动物,为什么只有人类能不断的进步,能创造文化?因为人类有历史,而别的动物没有。因为它们没有历史,不能把过去的经验传说下去……”,“同是动物,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创造历史,而别的动物没有?因为人类有变化无穷的语言。”但是,我们不禁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只

* 2016年4月25—26日,王士元先生应张玉来教授之邀,莅临南京大学,为文学院师生做了“语言与演化”“语言与大脑”两场演讲。本文是根据这两场演讲的内容,略加删改,整理而成,最后经王先生审定。

有人类能够形成自己的语言，而别的动物没有？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需要解释我们人类从何而来，又是如何一步步进化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对此，我们需要借助两方面的证据：一种是对别的动物的研究，另一种是对新发现的化石的研究。

演化生物学告诉我们，黑猩猩（chimpanzee）是生物圈里跟人类最具亲缘关系的动物。在 500—700 万年之前，我们与我们的远亲黑猩猩分化为不同的属（Genus），二者在基因方面仅存在 1.2% 左右的差别（Val-
lender, et al.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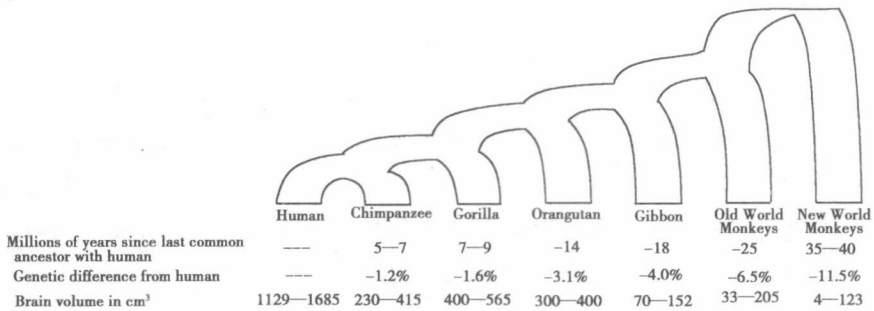


图 1 灵长动物分化时间、大脑容量及基因差异（Vallender, et al. 2008）

既然我们与黑猩猩在基因上有如此高的相似度，那么我们与它们在交际行为上是否也有相似之处呢？黑猩猩作为我们最近的亲戚，通过观察它们的交际行为，可以为我们了解人类早期的交际行为方式提供很强的借鉴，因为在没有分化以前，我们就是它们，它们就是我们。观察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观察它们之间自发的交流活动。20 世纪初期，Jane Goodall 率先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此后，荷兰科学家 F. B. M. de Waal (2005) 总结了百余年来我们所积累的有关黑猩猩的研究，认为黑猩猩有很丰富的沟通的能力，它们能用不同的表情、肢体语言和不同的声音传达不同的信息。另一种是观察它们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是一种非常微妙的能力，这种比较深入的认知能力非常重要，如果缺少了这种能力，语言就不可能发生。在自然界中，极少有动物能像我们人类一样具备这种能力，大多数动物都不知道自己是。如狗在镜子前经过时，就没有能力识别出镜子中自己的影像，或者它在屏幕上看到自己的动作时，也不知道那就是自己。但科学家（Povinelli & Vonk 2003）在黑猩猩

身上发现了这种自我意识的痕迹。他们在睡着的黑猩猩的耳朵上涂上颜色的标记，当这些黑猩猩醒来去照镜子，看到镜子里的黑猩猩耳朵上的颜色时，它们也会去摸自己的耳朵。

可是，能不能教会黑猩猩掌握人类的语言呢？从目前已有的情况来看，这种尝试是失败的。例如，20世纪20年代，一对美国的夫妇（Keith & Catherine Hayes）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抚养自己的孩子和一只同龄的黑猩猩幼崽。当人类的孩子到了一两岁，开始逐渐学会了说话的时候，即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只黑猩猩最终只学会了四五个单词的发音。所以我们无法教会黑猩猩发出人类的口语。后来，人们改进了教学的方式，不再强调口语的教授，而改用图形符号、打手势的方式，黑猩猩的表达能力得到提升，甚至能学到三四百个不同的词汇符号，包括很简单的句型。还有一些著名的例子，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黑猩猩 Washoe 在美国心理学家 Ganders 夫妇的教授下，成功地掌握了大量的美式手语动作之后，竟然能创造性地把不同的符号标记用新的方式组合起来，指示未知名称的对象，如用“水—鸟”来指称鸭子。但是，对于复杂的语法现象，黑猩猩并不能掌握。

上述黑猩猩学习人类语言的基本情况，大致上反映了几百万年前早期原始人处于萌芽时期的语言能力面貌。然而我们都知道，黑猩猩至今也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那么在这600多万年的历史演进中，到底是什么因素促进了人类语言的形成，使得我们变成我们，而它们还是它们呢？

一些化石材料也可以给我们提示观察的视角。

1974年，美国古人类学家 Johanson 等人，在埃塞俄比亚的阿瓦什低谷（Lower Valley of the Awash）发现了一具大约320万年之前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的化石，研究者们根据当时庆祝发现而播放的披头士乐团的一首歌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将她命名为 Lucy，并拟构了她的骨骼模型。从骨盆、膝盖、脚的结构、手和下肢的长度来看，Lucy 已经直立行走。后来，研究者们又在发现 Lucy 化石的地点附近，发现了一些脚印，这些脚印大概产生于350万年之前，与 Lucy 生活的时代比较接近。相关的数据分析（Johanson & Edgar 1996）显示，这些脚印的主人也已经能够直立行走。

以直立行走取代四肢着地的行走方式，是在人类的语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伴随着这种发展，双手就能够承担先前由嘴所完成的

很多任务，比如搬运和搏斗，这就使得语音的发展成为可能。此外，直立行走后得以解放的双手，逐渐承担了制造工具的职能，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之中，我们的双手日益迅速地变得灵巧而熟练，这进一步对神经系统产生了影响。具体而言，我们的大脑得到不断地锻炼，脑容量也不断增大。Ian Tattersall (2008) 等人的研究发现，在 600 万—300 万年之前这段长达 300 万年的时光里，灵长目动物的大脑容量几乎没有多大变化：300 万年前的南方古猿虽然站了起来，但由于不会制造工具，它们的大脑容量基本与 600 万年之前的乍得沙赫人猿 (*S. tchadensis*) 以及现代黑猩猩的脑容量相同，大概在 400cc。自开始制造工具以后，在过去的 200 万年之中，人类的大脑容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200 万年前的能人（如鲁道夫人 *rudolfensis*）的大脑容量大约在 600cc；100 万年前，原始直立人的脑容量已经达到了 850—1100cc；到了 10 万年前，智人（如尼安德特人 *Homo neanderthalensis*）的大脑容量已经与现代人的大脑容量相当，平均大约为 1400c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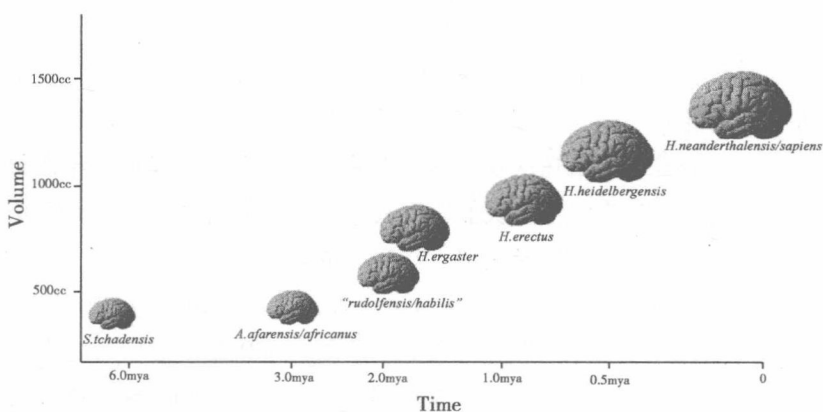


图2 大脑容量示意图 (Tattersall, 2008)

当然，上述关于直立行走对大脑容量影响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描述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趋势。科学是无止境的，随着新的化石材料的发现，我们的认识也会不断加深。2015年10月，*National Geographic* 报道，在南非发现了纳勒迪人 (*Homo naledi*) 这一新的人种的化石，其大脑容量却非常小，还不到现代人脑容量的一半，男性只有 560cc，女性的更小。所以我们这方面的材料越多、越丰富，分析的方法越精确，我们对

们的起源、演化的过程的认识也就会越清晰。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直立行走给我们人类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它使人体产生了专门针对语言的适应变化，为我们的发音提供了更为合适的生理构造（如图3）。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直立行走使得现代人的喉部位置明显低于黑猩猩以及我们的远古人祖先。喉部的下降，使我们有了一个从唇到喉之间的弯曲声道，而其他灵长目动物的声道相比之下要直一些。此外，由于喉部从软腭降低，喉管中负责发声的通路随之变长，口腔中用于调音的管路变短，当舌身在口腔中向前向上移动时，在咽部就产生了一个较大的空腔。这种口腔与咽腔相通的双管系统（twin-tube system）的声学构造，让我们能够在正常的说话发音过程中，通过改变口腔和咽腔的形状和大小，得到种类丰富的共振频率，也就为我们人类能够发出更为多样的语音提供了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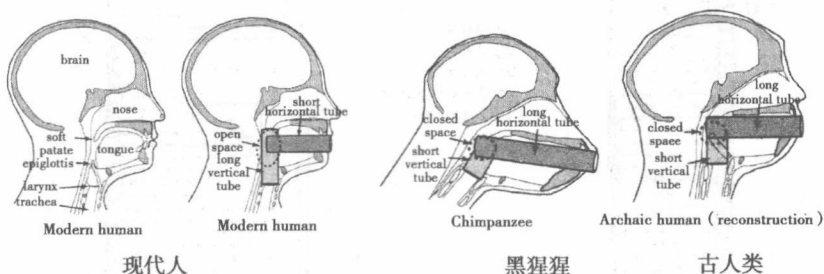


图3 黑猩猩、古人类及现代人的发音通路示意图 (Lieberman, 2013)

二 现代人迁徙到全世界

作为世界科学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达尔文，在他 1859 年的那部巨著中提到，很可能我们的祖先曾在非洲居住。^① 但是达尔文的这种假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现代科学的验证。1987 年，Berkeley 人类学系的学生 Rebecca L. Cann (1987) 首次用基因证明了现代人起源于非

^① “……it is somewhat more probable that our early progenitors lived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than elsewhere.” Charles Darwin 1859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洲。Rebecca 在学校附近的医院收集了 147 个不同女性的胎盘，从中析取出母系的线粒体（mitochondria）的 DNA，然后以统计学的方法建构了人类演化的树图（如图 4）。这些女性分别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澳大利亚等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但她们体内的线粒体 DNA 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位祖先是大约生活在二十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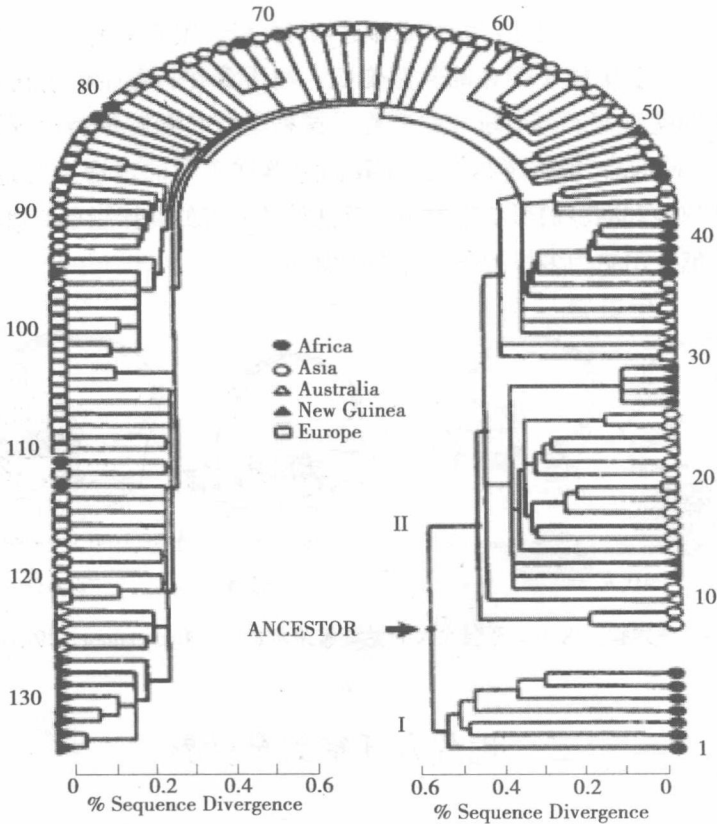


图 4 mt DNA 母系树图 (Cann, et al. 1987)

Rebecca 的研究给现代人的非洲起源说提供了很强的证据支持。但是，由于线粒体 DNA 中只含有 37 个基因，所能提供的信息较少，而且 Rebecca 所搜集到的样本数量也不多，有些学者对她的研究结果产生了怀疑。为了避免上述缺陷，一些人口遗传学家如 Luigi Luca Cavalli-Sforza (2000) 等人，借助含基因数更多的 Y 染色体 (Y Chromosome) 来分析现代人演化的历史。他们得出的结论 (如图 5) 也证明了现代人起源于非

洲，与 Rebecca 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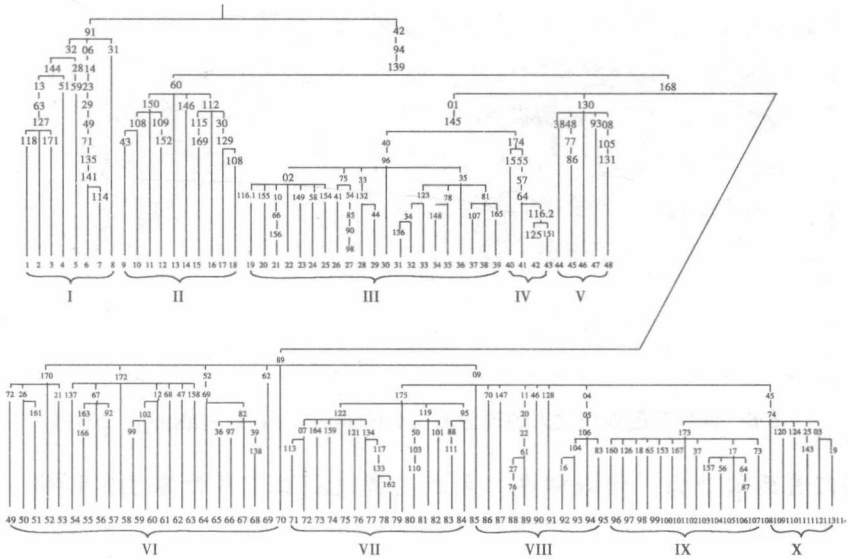


图 5 人类 Y 染色体序列变异图 (Cavalli-Sforza, et al. 2000)

Cavalli-Sforza & Feldman (2003) 又进一步依照遗传学的结果，描绘了世界范围内现代人的迁徙图（如图 6），展示了现代人是如何从非洲一步步进驻到世界上的其他领地的。他们认为，在大约十万年以前，现代人离开非洲，向亚洲迁徙，在到达亚洲以后便分为南北两支——南支从海路在四万年前抵达东南亚和澳洲，北支从陆路在五六万年以前到达中国。到达中国的人类又分为东西两路继续迁徙，西路在大约四万年以前到达欧洲大陆；向东路进发的现代人则于一万五到三万五千年以前跨越白令海峡，踏上北美大陆，随后南迁，扩散至南美。至此，现代人基本完成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迁徙。

施莱哈尔 (August Schleicher) 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启发下，提出了著名的谱系树理论 (Stammbaumtheorie, family tree theory)，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中影响深远。语言谱系树上每一个语支的分化与历史上人口的迁徙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或者说，语言学家能否像达尔文说的那样，以人种的谱系为依据来研究语言谱系分类呢？Cavalli-Sforza (1988) 等人曾经做过相关方面的研究。他们将现代人的基因谱系与 Greenberg 所划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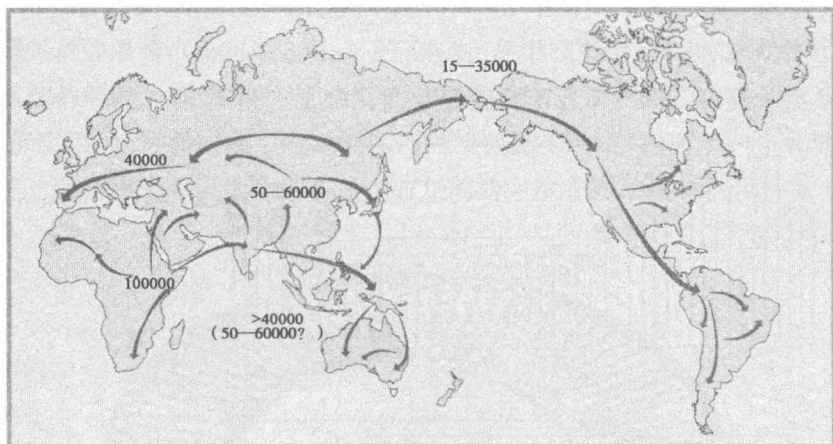


图 6 世界范围内现代人的迁徙图 (Cavalli-Sforza & Feldman, 2003)

语言谱系整合为一张双树图, 发现二者之间具有非常多的相同性, 如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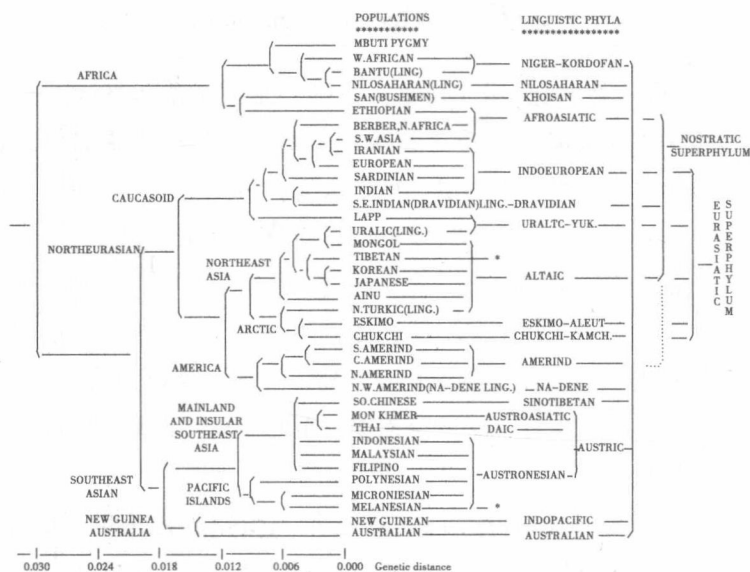


图 7 基因谱系与语言谱系双树图 (Cavalli-Sforza, et al. 1988)

现代人在迁移到中国以后, 又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呢? 根据张光直 (Chang 1986) 的研究, 中国境内出现的一些早期遗址群组在 9000 年前仍

是相互独立的和彼此分离的。在 7000 年前，这些群组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到了大约 6000 年前，这些原本各自独立的群组，如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开始展现出很大程度的相互影响，转变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文化网络，“初始的中国”（initial China）逐具雏形。当时文化网路中的那些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是不相同的，在 Zhao & Lee（1989）看来，可以总体上将他们分为两支：长江流域的文化和黄河流域的文化，这两个流域的文化，共同孕育了现今国内的各个民族。

三 语言的涌现及设计特征

所有的动物都有沟通的能力，动物若无沟通能力，也就无法生存。但是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才有能力使用语言进行沟通。关于语言究竟为何物，亦即一个系统必须具备哪些必要和充分条件，才称得上是语言，Hockett（1960）首度提出了“设计特征”（design features）的概念，共十三种（如图 8），分别为：1. 声耳渠道（vocal-auditory channel）；2. 四散传播与定向接收（broadcast transmission and directional reception）；3. 迅速消失（rapid fading）；4. 互换性（interchangeability）；5. 整体反馈（total feedback）；6. 专门化（specialization）；7. 语义性（semanticity）；8. 任意性（arbitrariness）；9. 分离性（discreteness）；10. 超越时空（displacement）；11. 能产性（productivity）；12. 传统传导（traditional transmission）；13. 二重层级性（duality of patterning）。只有同时具有上述十三种设计特征的沟通，才能称得上是语言的沟通。

其中，较其他所有动物的沟通形式而言，超越时空性、能产性和二重层级性是只在人类的语言沟通方式中才具有的特征。

“超越时空”是指，人类在沟通时不仅仅能够谈论此时此地的事物，异时异地的东西也能成为彼此交流的对象。不受时空的限制，是我们能够顺利沟通的保障。“能产性”是针对语言系统的开放性而言的。我们可以利用语言系统中已有的单位，按照以往所熟悉的各种规则进行组合，创造出新的话语。“二重层级性”主要涉及语言系统中意义与形式或者说“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在任何一种语言里，有意义的成分数量都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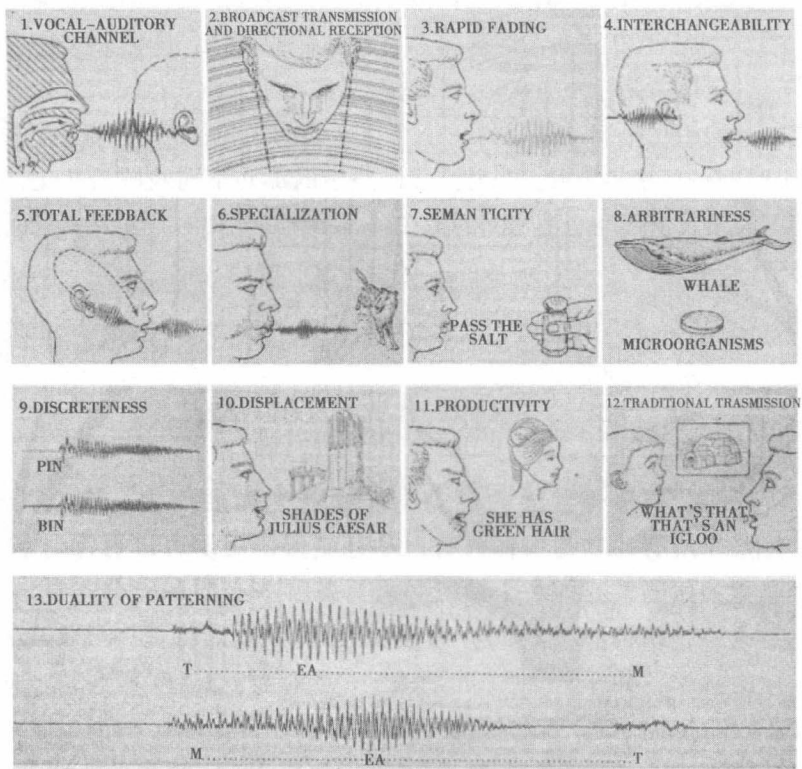


图8 Hockett 提出的语言的 13 种结构设计特点 (Hockett, 1960)

大,然而,它们却由少量可以辨别的、本身没有意义的音素组成的很小的单位来体现。荀子对语言系统中“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至善名。(《荀子·正名》)

也就是说,意义和形式之间并无天然的联系,我们之所以能够用某种语言形式来表达特定的意义,完全是社会群体之间约定俗成的结果。